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

文选

导读

屈守元 著

巴蜀书社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

文选导读

巴蜀书社

巴蜀书社
一九九三年成都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周田青

封面设计：陈世五

文选导读

屈守元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625 插页4 字数300千

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90册

ISBN7-80523-547-3/I·215 定价：7.90 元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编委会

主编 蔡尚思

编委 陈子展 谭其骧 顾廷龙
胡道静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土壤之中，根深叶茂。今天的中青年同志，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着这一宏富的历史遗产，因此，对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用新的方法进行反思和扬弃，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让它在“四化”建设和世界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是广大中青年应尽的历史责任，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要正确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扬弃，必须从直接阅读古代文化要籍入手，面对这些要籍，不少中青年同志苦于有关文化修养的障碍，亦苦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无法深入中国古代文化要籍的堂奥探幽致远，因而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反思和扬弃。基于此，我社决定为广大中青年同志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这套丛书从中华文化的“根”出发，撷取其中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著作，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分册导读，使广大中青年同志能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学习、了解、深入中国文化的主要典籍，取得较大收获。

这套丛书，重点在“导”，要通过这套丛书引导广大中青年同志正确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引导他们深入发掘曾长期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文化瑰宝；引导他们辨别和扫除窒息人心的文化毒素；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每本要籍导读的作者，大都约请对该古籍素有研究，成绩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第一流专家担任。

丛书每种一般不超过二十万字，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导言，这是全书之重点，其中不仅要介绍该要籍的作者与全书概况，而且要介绍这部书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并着重从方法上对读懂要籍给予具体指导，即讲解清这部书怎样才能读懂，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将告诉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这部书的途径和应当阅读的有关著作。第二部分是该要籍的精选和简注。导言和简注不仅要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同时亦要反映导读者多年的研究之得并适当吸取当前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本丛书由著名文化史专家蔡尚思先生担任主编，并由蔡尚思、陈子展、谭其骧、顾廷龙、胡道静等先生组成编委会，负责指导丛书的工作。

总之，本丛书希望搞出新的风格和特点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帮助解决广大中青年的学习难点，也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但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不吝赐教。

自序

《文选》是现存传统文化典籍中的“总集”之首，它已流传了一千五百多年。对它的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文选》学”（或称“《选》学”），也已经一千四百年了。不仅中国历代，即邻邦日本和韩国，也有这种“《选》学”。到今天，更不止中国海峡两岸，而“《选》学”已成为遍及欧美的世界性学科了。

巴蜀书社编辑《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要我承担《文选导读》的编写任务，我不自量力，欣然接受了。六朝（特别是齐梁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仅仅是文学批评就有《诗品》、《文心雕龙》等，已成为家传户诵的经典。而文学作品的总汇——《文选》，却显得研究者有些冷落。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诗品》、《文心雕龙》的研究热潮，近来似乎有点转向《文选》了。这是十分应该，而且必要的。

我写这本书，按照《丛书》的体例，分作《导言》和《选读》两部分。两百年前汪师韩（韩门）的《文选理學權輿》，是我写《导言》部分的向导；而六十年前高阆仙（步瀛）先生的《文选李注义疏》，则是我写《选读》部分之所取法。当然，今

天的新材料，例如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唐写《集注》本，以及新印的淳熙池阳郡斋本、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影印的明州本，《古籍丛残》影印的敦煌写本，这些前辈学者未见到或未全见到的，自然宜有所介绍，或加以采掇。“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学术的发展，本应该如此。只可惜我没有作好我这个“后出”的工作而已。

旧作《昭明太子十学士说》，载在《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中，引起“《选》学”者的注意。对于“十学士”的设置时间，有同志关心，提出异议。窃谓当时东官既无此职官，设置时间，似不必过泥。本书所写，姑仍旧说。

《文选》的编辑，是很注意文学发展趋向的。它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即是齐梁文学。可现在仍有些习惯于“口耳四寸之学”的人，一提到齐梁，不顾一切，就要扣一顶“形式主义”的帽子，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鄙弃。按此推理，《诗品》、《文心雕龙》的作者，钟、刘两位先生也无法伸腰了。其实一般所谓“古文”家都吹捧的作品，不一定能代表《文选》，因此，《选读》部分，特选了齐梁文人如刘峻、任昉、陆槿、王巾等的作品。这些作品应该如何评价，可能有争议。但有个前提：就是要请冷静下来，认真多读几遍。不然，就得取消发言权。

我的“《文选》学”，是从先师向宗鲁（承周）先生学来的。宗鲁先生有志于全部爬梳整理《文选李注》。美志不遂，中年殒落。我遽然进入中寿。有生之年，必为完成先师遗志尽力。先师命我全部过录他所详校的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的二十一卷全书，现今已成为唯一的这个本子的影子了。写作此书，不胜今昔源流之感！

此书的稿子三十万字，全由老伴管舜英手抄。她本是“步趋齐梁”的《骈体文抄》五十年前的研究者。对此稿献疑起予，功超游夏。慕床吟病妇之行，暗牖写仙姬之韵。白头著书，得此良侣，书生之幸，亦太平之象也。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写成，再过十三日，即旧历壬申腊月初八，贱降八十周岁之日也。成都屈守元记。

目 录

自 序 导 言

第一 关于《文选》产生时代的文化氛围·····	1
(1)建安以来“文学”概念的改变·····	1
(2)总集的出现及其体例的完成·····	4
(3)《文选》才是真正的总集，也是现存最早的总集·····	8
(4)《文选》和当时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关系·····	12
第二 《文选》的编辑·····	16
(1)昭明太子萧统·····	16
(2)“昭明太子十学士”和《文选》的编辑·····	21
(3)关于《文选》编辑的谬说·····	32
(4)《文选》成书前后萧梁皇室所编辑的一些类书、总集 ·····	38
第三 《文选》学史略述·····	45
(1)萧该《文选音》是研究《文选》的第一部著作·····	45
(2)曹宪建立“《文选》学”，其著作及其影响·····	48
(3)李善注——《文选》学的权威著作·····	52
(4)李善同时的《文选》学家——许淹、魏模和公孙罗 ·····	61
(5)《文选》学的庸俗化——五臣集注·····	66

(6)唐开元、天宝间《文选》的注释、修续热潮——冯光震、萧嵩、陆善经等·····	75
(7)《文选》给唐代诗文的影响·····	80
(8)唐代《文选》学给边陲和域外的影响·····	86
(9)宋代以后《文选》学的衰落·····	89
(10)近世《文选》学的复兴及其展望·····	99
第四 清儒《文选》学著述举要·····	103
(1)《文选音义》·····	103
(2)《文选纪闻》·····	104
(3)《文选理学权舆》·····	105
(4)《文选理学权舆补》·····	108
(5)《文选考异》·····	109
(6)《文选李注补正》·····	110
(7)《文选笔记》·····	111
(8)《文选考异》·····	113
(9)《选学胶言》·····	116
(10)《文选集释》·····	118
(11)《文选旁证》·····	119
(12)《文选笺证》·····	120
第五 《文选》流传诸本述略·····	121
(1)无注三十卷本·····	122
(2)李善注六十卷本·····	136
(3)五臣注三十卷本·····	139
(4)六臣注六十卷本·····	140
(5)集注一百二十卷本·····	142

第六 怎样阅读《文选》	146
(1)对《文选》的评价要正确	146
(2)阅读《文选》一定要口到	148
(3)不宜用庸俗的批点法读《文选》	149
(4)读《文选》的程序	150
附录一 萧统《文选序》和李善《上文选注表》章句	151
附录二 《选学椎轮初集》台湾版序	171

选 读

谢希逸 月赋(赋庚,物色,卷十三)	176
祢正平 鹦鹉赋(赋庚,鸟兽上,卷十三)	189
古诗十九首 (诗己,杂诗上,卷二十九)	208
傅季友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教,卷三十六)	233
任彦升 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文,卷三十六)	241
江文通 诣建平王上书(上书,卷三十九)	256
谢玄晖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笈(笈,卷四十)	272
应休琰 与广川长岑文瑜书(书中,卷四十三)	281
赵景真 与嵇茂齐书(书下,卷四十三)	287
陆士衡 豪士赋序(序下,卷四十六)	296
刘孝标 广绝交论(论五,卷五十五)	309
陆士衡 演连珠(选前四首,连珠,卷五十五)	354
陆佐公 新刻漏铭(铭,卷五十六)	360
潘安仁 马汧督谏(谏下,卷五十七)	380
王简栖 头陀寺碑文(碑下,卷五十九)	406
谢惠连 祭古冢文(祭文,卷六十)	451

导 言

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辑的《文选》，不仅是古代文学的必读之书，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不仅影响隋、唐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波及七、八世纪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学创作。近代以来，港、澳地区和新加坡、朝鲜、英、法、德、美诸国，都兴起了《文选》学研究的热潮；邻邦日本九州大学《文选》学史研究会编印了《文选研究论著目录》；我国台湾也出版了《选学丛刊》。弘扬民族文化，必须注意到《文选》这样一部文学经典巨著的整理和研究，这是无疑的。要诵习、研治这部书，非短篇小册所能尽言；讲到导读，更非浅闻陋见所可胜任。下面只准备谈点个人学习的体会，供爱好这部书，有志于研读这部书的同志的参考。

第一 关于《文选》产生时代的 文化氛围

(1) 建安以来“文学”概念的改变

“文学”一词，出现很早，孔子门下的四科，便有文学。

《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皇侃《义疏》：“范宁曰：文学，谓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学指博学古文。”根据这样的概念，文学不过是文献典籍之学，通晓文献，诵习文献，写文献，润色文献，都叫文学。当然，孔门所学的文献，主要指儒家经典。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可以见得，文学的功能之一在于修订经典。直到汉代，所谓“贤良文学”、“文学掌故”（见《汉书·公孙弘传》、《儒林传》及《盐铁论》等），“文学”的含义，基本与《论语》相同。但事物的发展，并不能老是按照孔门四科的规定，正像“赋”本“六义附庸”，却“蔚成大国”（见《文心雕龙·诠赋》）一样，文学也逐渐摆脱它作为经、史、诸子的附属地位，各自独立了。建安时代（公元三世纪初）的这种变化，比较显著。这个时代，曾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而已集》）。“自觉”就是自我感到它是独立存在的，并不只能作为某些经典著述的附属品。

不过，文学的自觉，似乎还不能就算是“为艺术而艺术”。西方十九世纪初期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派理论，究竟如何，我无权发言。如果作为文学自觉，中外历史，都要经过这么一段历程，本有共同之点，或者不无道理。但是建安时代的文学主张，却并不是十九世纪的西方模式。

魏文帝曹丕（187—226）是建安时代提倡文章华丽的代表人物。他的《典论论文》（见《文选》卷五十二）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这

段话既阐明了文学自觉的观点，也强调了文章的作用：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是不相同的；它“不托飞驰之势”，不是经、史、诸子的附属品。

建安时代文学概念的改变，就在于它脱离作为经、史、诸子附属品的地位，认识了文学本身存在的价值；它重视了“翰墨”、“篇籍”的作用，也没有忽略它“寄身”、“见意”的功能。刘勰叙述建安时代的文学特征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用这段话与《典论论文》所说，互为补充，对于建安时代文学概念改变的历史真实就更为全面了。

建安以后，文学发展的主流，正是按照它摆脱经、史、诸子的附属地位，而又自己选择了它的意向，发挥了它的功能，独立前进的。

建安时代还出现了与文学概念的改变相配合的一种现象，那就是综辑单篇文学作品的典册，开始称之为“集”了。《后汉书·文苑传》大抵是本之西晋张鹭《文士传》（张鹭为西晋人，说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一类材料写成的。《文苑传》所载人物的作品，都只说赋、诗、颂、铭、碑、诔等若干篇。可见东汉时代还没有人把这些单篇作品，编成什么集子。曹丕《与吴质书》（《文选》卷四十二），谈到“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却说：“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又说：“观其姓名，已为鬼录。”汇聚作品，记载姓名，称之为“集”，“集”这个名称的出现，此处恐怕是很早的了。事隔五十年，西晋荀勖编《中经新簿》，把“诗赋、图赞、汲冢书”编在丁部（见《隋书·经籍志》，事在泰始十年，即公元274年），

文学作品已与“六艺、小学”，“古子、近子”，“史记”平行。又隔五十年左右，东晋李充编《四部目》，更把丁部的“诗赋”与甲部“五经”、乙部“史记”、丙部“诸子”等分，基本上形成了“经”、“史”、“子”、“集”分类格局（见《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晋书》）；但“诗赋”仍然沿袭了《七略》分类之名，是否并包韵语以外的文章，还不可知，而且也没有用“集”这个称呼。可能文学作品在当时以单篇形式存在的情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又隔一百多年，南齐王俭编《今书七志》，有了“文翰志”的专名（南齐元徽元年，即公元473年，见《隋书·经籍志》），这就在刘宋以“儒”、“玄”、“史”、“文”四学分立（元嘉十六年，即公元439年，见《南史·宋本纪》）后的三十四年，正式称之为“文集录”，却出现在五十年后梁阮孝绪编的《七录》（事在梁普通中，即520—527年，见《广弘明集》卷三）。那就离《文选》编辑的时间很近了。文学概念的改变，与集部（别集、总集）在文献学史上四分法中独占一分地位的形成，是有密切关系的。文献学史上的文集一类的独立，反映了文学的脱离附庸地位，作品的增多，编集之风的盛行。

（2）总集的出现及其体例的完成

《隋书·经籍志》是史志中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纂的第一种。它的叙释明确地说，集部即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继承。集部分三种，即“楚辞”、“别集”、“总集”。叙释说：“别集之名，盖东汉之所创。”这个话是否有依据，今不可

知。按之上文,《后汉书·文苑传》记载各家的文学作品,实无集称。《隋志》著录的《魏太子文学徐干集》以上,凡有四十部,属于东汉以前的别集(包括西汉以前的《楚兰陵令荀况集》、《楚大夫宋玉集》)就有十七部。说东汉始创别集,叙释与著录内容本身就矛盾。其所著录东汉杜笃诸人之集,又与《后汉书·文苑传》所载全不相应。可见东汉创别集之说,是靠不住的。把单篇作品编次为集,不可能出现在建安以前。凡建安以前人物的别集,都属于魏、晋以后的人所纂辑。

《隋志》著录的总集,以挚虞《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志论》为首,叙释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又(元大德本“又”字作“文”)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这段话有值得注意之处:

第一,它把建安时代作为文学繁盛的时代,而且认为从此以后众家之集滋广。这是历史的真实。特别是众家之集滋广,为总集的编辑提供了可能,也为总集的编辑点明了必要。众家之集到建安后才日以滋广,又说明了别集的编纂是此后重视文学作品,才把前人流传的单篇,汇成集子的。集的产生与文学自觉是相配合的。

第二,它指出了总集的编辑是要经过选拣,有所淘汰的。作品多了,表示文学创作的繁荣。从多中比较、鉴别,便会出现优胜者。这是自然规律。不如此,不能提高,也无所谓发展。览者的劳倦,就在于劣品的充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